

试述 17—19世纪武吉斯人 航海贸易的兴衰

冯立军

内容提要 在国外学术界,对 17—19 世纪武吉斯人航海贸易的研究较多。在国内学术界,研究十分薄弱。本文^①通过对武吉斯人与望加锡人的关系、以及武吉斯人在马来群岛进行贸易的深入考察和分析,主要阐述了武吉斯人海外贸易从苏拉威西本土的兴起到蔓延整个马来群岛贸易网络的建立过程,深入分析了武吉斯人航海贸易发展的内外因素,并阐明了他们在马来群岛岛际贸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武吉斯人 航海贸易 马来群岛

武吉斯人(Bugis),也译为“布吉斯人”或“布吉人”,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之一,最初的聚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旧称西里伯岛 Celebes)的西南半岛上,南纬 3°—4°之间,波尼湾的西海岸一带。

武吉斯人性格勇敢、勤勉、简朴、诚实、温厚,东来的殖民者评价他们是所有马来群岛土著居民中最先进、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②。由于自然的原因,他们生活的地区与爪哇岛及其他火山岩岛相比,土壤贫瘠,农业发展有限,农业生产所得不足以供给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因而,航海贸易成为武吉斯人的主要生活来源^③。

较早提到武吉斯人航海贸易活动的是来自武吉斯人的本土典籍。其中记载说,早在 14 世纪时武吉斯人即已开始了他们的航海贸易活动^④,至 16 世纪已有他们到马六甲、暹罗、爪哇、勃泥和彭亨等地进行贸易的记载^⑤。由于史料的缺乏,武吉斯人在 16 世纪以前的航海贸易活动,我们并不能窥知其全貌。自 17 世纪以后,随着武吉斯和望加锡势力的崛起,他们在与欧洲人贸易的角逐中,给予西方势力以极大的触动。之后虽有挫折,但武吉斯人仍顽强地建立起了蔓延整个马来群岛的商贸网

① 本文为 200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BM Z032)的阶段性成果。

② G. W. 厄尔:《东方海域见闻》(G. W. Earl *The Eastern Seas*),伦敦 1971 年版,第 389 页;J. H. 摩尔:《马来群岛及其毗邻国家纪闻》(J. H. Moor *Notice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Adjacent Countries*),新加坡 1837 年版,第 24 页。

③ 约翰·克劳福德:《马来群岛历史辞典》(John Crawford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 Adjacent Countries*),牛津大学 1971 年版,第 88、89 页。

④ 约翰·克劳福德:《马来群岛历史辞典》,第 75 页。

⑤ 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7 页。

络,成为马来群岛岛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遗憾的是,学术界并没有给予这一课题足够的关注,研究成果寥寥无几^①。因此,本文拟以武吉斯人的航海贸易活动为题作一研究,以期达抛砖引玉之效。

一、17世纪武吉斯人与望加锡的兴衰

17世纪武吉斯人的航海贸易是与望加锡及望加锡人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两者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截然不同,但生活地域的彼此相邻以及望加锡优越的地理位置仍将他们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吉斯人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只有许多各自为政的小邦,每一个小邦都由各部落选举出的王子领导。为了多种需要,小邦之间也会组成一个较大的联盟,如波尼联盟(Boni或 Bone)由8个小邦组成,瓦乔联盟(Wajo或 Waju)由多达40个小邦组成。波尼联盟位于瓦乔联盟的南部,而在波尼联盟南部则是望加锡人控制的区域。

望加锡毗邻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从16世纪初开始,即有大批的来自于柔佛(Johor)、甘巴(Campa)和米南加保(Minangkabau)等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到望加锡贸易^②。但当时望加锡人并未皈依伊斯兰教,直到17世纪初望加锡人才开始接纳伊斯兰教。“受到新信仰的刺激”,望加锡逐渐把势力扩展到它的邻国。“它指望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顺着伊斯兰教前进的潮流可以得到更好的成功机会”。这样,望加锡统治者的改宗就成为它对北部国家进行一系列远征的序幕。这些国家被迫接受伊斯兰教,同时也被迫承认望加锡的宗主权^③。因而,从武吉斯人的波尼和瓦乔两个联盟到西里伯岛西南部所有弱小国家,甚至马来群岛的松巴哇岛上各邦以及苏拉群岛(Xulla Isles)、布通(Butung)、淳泥、库泰、布鲁(Baru)和巴厘等邦都先后臣服于望加锡^④。在望加锡最强盛时,群岛中约有70个小邦宣誓向它效忠^⑤。

望加锡的对外扩张显然带有伊斯兰教扩张的因素,但其在扩张中想与荷兰人分享马鲁古群岛香料贸易的企图也显而易见。其一,受武吉斯人的影响,望加锡邦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对外主张自由贸易。不仅给予国内人民充分自由贸易的机会,而且在其扩张中广泛招揽其他国家、地区或民族的贸易商到望加锡,使望加锡成为众商云集的商贸中心^⑥。其二,值得注意的是,被荷兰人打败并失去了曾独占香料群岛贸易的葡萄牙人亦被允许“利用望加锡的统治者来掩护他们”进行走私贸易^⑦。这一策略使望加锡逐渐成为印度尼西亚东部的主要贸易集散地。当1641年荷兰人攻占马六甲后,望加

① 国内外学术界对武吉斯人的研究比较薄弱,在国外,关于武吉斯人的研究记载大多散见于西方人的著作中,而国内的研究则更少。国内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许少峰的《略论十八世纪布吉斯人在马来亚的活动和影响》,该文对18世纪武吉斯人的政治经济活动给予了简单的阐述。详见《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1、2期。

② 狄奈·伦巴第等:《印度洋和中国海的亚洲商人》(Denys Lombard and Jean Aubin, *Asian Merchants and Businessmen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China Sea*),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③ D. G. E. 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3页。

④ 约翰·克劳福德:《马来群岛志》(John Crawford's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第2卷,爱丁堡1820年版,第515、517页。

⑤ 狄奈·伦巴第等:《印度洋和中国海的亚洲商人》,第258页。

⑥ 这里不仅有武吉斯商人、伊斯兰商人而且有欧洲殖民者和中国海商。详见约翰·克劳福德:《马来群岛志》第2卷,第522页;D. G. E. 霍尔:《东南亚史》上册,第370页;狄奈·伦巴第等:《印度洋和中国海的亚洲商人》,第257页。

⑦ 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著,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版,第217页。

锡又担当了葡萄牙人经营的澳门与南洋诸岛贸易航线的重要角色。鉴于此,葡萄牙人与望加锡的联系逐渐加强,并建立联盟,坚定地支持望加锡的对外发展和扩张^①,使其在马来群岛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但是,由没落的葡萄牙人支持的望加锡的扩张,严重地威胁到了荷兰殖民者的利益。史籍载:“武吉斯与望加锡人向东部的扩张,强化了他们在与马鲁古群岛进行香料贸易中的角色,他们在安汶、德那地、蒂多雷、多波和塞兰岛的北部海岸以及它东部的塞兰海和戈龙岛(Gorong)建立起了永久的殖民地。他们成为香料贸易中最重要的中介,与之进行香料贸易的,有的是‘合法的’,也有的是‘非法的’,但荷兰人一概视其为走私”。因为武吉斯和望加锡人的扩张及其在对外贸易中实施的自由开放政策,与荷兰人的渴望经济垄断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因而荷兰人不断向望加锡施加压力,企图中断望加锡与葡萄牙人的贸易关系。但是,望加锡仍然坚持“对所有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不仅允许葡萄牙的船只靠岸,也允许丹麦、英国和法国的船只靠岸,而且它长期成为香料贸易的一个竞争中心”^②,并与城内的马来商人合作突破荷兰人的封锁^③。

荷兰人最终采取了行动。1666年,荷兰人与原来被果阿望加锡所击败的波尼武吉斯人及安汶人组成了强大的远征军,击败了望加锡,并于1667年11月签署了《旁卡耶(Bungaya)协定》。根据此协定,望加锡首先要驱逐葡萄牙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承认荷兰的最高统治权,给予荷兰人贸易垄断权^④。尽管望加锡苏丹企图回避合约条款,但荷兰人再一次占领了他的城市,迫使其退位,并把西里伯南部置于总部设在鹿特丹要塞的荷兰总督管辖之下^⑤。

望加锡的失败,迅速颠覆了武吉斯和望加锡人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平衡,前者逐渐转向更为专制的政府形式,望加锡逐渐衰落,瓦乔武吉斯人联盟亦随之衰落。在经济上,荷兰殖民政府强制限制望加锡与其他地方拥有任何稳定的关系,这伤害了所有非荷兰商人的利益^⑥。受此影响,瓦乔武吉斯人开始大批向外迁移。其一是迁移到曼达尔(Mandar)、卢伍(Luwu')和望加锡地区;其二是迁移到其他各岛,如松巴哇、加里曼丹、廖内、苏门答腊和柔佛等地区。据记载有很多是整个家庭在他们自己本地酋长的指引下,甚至是在本土王子的带领下循着旧的商业路线移居国外^⑦。

二、18—19 世纪中期武吉斯人在马来群岛的贸易扩展

在众多迁移的武吉斯人中,有一个叫拉·玛都克楞(La Maddukelleng)的王子,随同他一起迁移的有他的3个儿子和8个贵族以及200人的随从。他先到柔佛,后又到婆罗洲东海岸并与巴昔(Pasir)苏丹的女儿结婚,成为巴昔的苏丹。大约10年后,他回到南西里伯,重建瓦乔武吉斯人的统治。而跟随他的8个贵族亦大都建立了自己的基业。

① 关于葡萄牙人大力支持望加锡对外扩张的情况详见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约翰·E·卡迪著,姚楠等译:《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277页。

② 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第264页。

③ 狄奈·伦巴第等:《印度洋和中国海的亚洲商人》,第257页。

④ 安东尼·里德:《1450—1680年贸易时代的东南亚》第2卷,(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耶鲁大学1993年版,第279—280页。

⑤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上册,第396页。

⑥ L. A. 米尔斯:《1824—1967年的英属马来亚》(L. A. Mills *British Malaya 1824—1967*),牛津大学1966年版,第15页。

⑦ 狄奈·伦巴第等:《印度洋和中国海的亚洲商人》,第258页。

富有传奇色彩的记载充分说明了望加锡陷落后,他们作为在国外散居的商业群体,比以前在自己家乡的时候更加成功。下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叙述这一时期武吉斯人的航海贸易活动。

(一)在马来半岛对锡资源及贸易权的争夺与控制

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在其所著《东方志》第6卷中有这样的叙述:“从马六甲一直到吉打,全是产锡之地,所有产锡之地以前都属于马六甲苏丹所管”。锡产地有:双溪·求刺、雪兰莪、巴生、伯南、孟琼、木歪和霹雳。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控制产锡的霹雳、吉打。1641年荷兰人夺取马六甲后不久,因为锡在他们同印度和中国交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对于控制这些产锡的国家也表现得跃跃欲试。1642年荷兰人与吉打订立协定,规定吉打把锡产品的一半交由荷兰人贸易,1645年的班格里则被迫答应交付全部产品。1650年荷兰人迫使霹雳的宗主国亚齐签订一项条约,规定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她分享霹雳的锡业贸易,而将其他商人全部排斥在外。虽然霹雳无意履行条约内容,但1657年在荷兰舰队的封锁下,亚齐和霹雳无奈让步,三方重新订立条约,规定霹雳锡出口的1/3归亚齐人,2/3归荷兰东印度公司。1664年荷兰与暹罗达成协议,同其控制下的洛坤和雪兰莪签订各项专利协定,1683年荷兰人从柔佛手中取得在硕坡新发现的锡矿的垄断权^①。

荷兰人在马来半岛对锡的垄断已很显然,但随着18世纪的到来,马来群岛局势的变化对这种垄断提出了挑战。一是自18世纪以来荷兰整体实力开始衰落,使得它在整个马来群岛的控制力开始减弱,这给了其他势力介入的机会。二是英国势力的参与。进入18世纪,英国人开始更多地重视马来群岛地区,因为“群岛地区是英国印度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英国香料的主要来源,更为重要的,它是英国与中国贸易的一种补偿手段”^②。此外,18世纪欧洲人与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在广州进口锡的需求甚至多于对银的需求,因而,英国人希望与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国家或邦加能够保持一种持续的锡贸易。英国人将其视为从“长期休眠”状态下恢复他们在马来半岛利益的一种行为。英国人采取批发购买的方式,从林加、雪兰莪和吉打大量购进锡,而荷兰人则根本无力阻止英国人的这种行为^③。三是对荷兰人的锡垄断产生最大和最直接威胁的是武吉斯人势力在马来半岛地区的增长。从西里伯西南半岛“逃离”的一部分武吉斯人曾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军而服务于西苏门答腊和爪哇,但他们并不甘心于此,“独立且永不屈服的精神,驱使他们来到马来半岛”。1700年他们在雪兰莪居住下来,到1718年他们的势力已经扩大到雪兰莪的海岸及沿河地区,使“雪兰莪成为他们奇袭整个半岛西海岸的行动基地”^④。1722年,在柔佛帝国与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的硕坡米南加保王朝斗争中,武吉斯人首领丹·普拉尼支持柔佛帝国,将统治柔佛的米南加保统治者罗阁·格己从廖内(柔佛帝国的都城)赶走,并把原柔佛帝国苏丹阿勃都尔·者利的儿子罗阁·苏莱曼扶上王位。新苏丹被迫任命丹·普拉尼的长兄为廖内的副王,而他自己却以武吉斯人的傀儡身份当朝^⑤。从此时起,武吉斯人就成为了柔佛的真正统治者。廖内成为武吉斯人势力的中心,他们从廖内控制吉打和霹雳这两个产锡国。1740年武吉斯人首领罗阁·罗牟成为雪兰莪的苏丹。两年后,他又率兵侵入霹雳,

①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上册,第419—427页。

② 尼古拉斯·塔林:《1780—1824年英荷在马来亚的竞争》(Nicholas Tarling *Anglo-Dutch Rivalry in the Malay World 1780—1824*),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③ L. A. 米尔斯:《1824—1967年的英属马来亚》,第14页。

④ L. A. 米尔斯:《1824—1967年的英属马来亚》,第15、74—75页。

⑤ L. A. 米尔斯:《1824—1967年的英属马来亚》,第15页;D. G. E. 霍尔:《东南亚史》上册,第427—428页。

建立了武吉斯人在该地的直接控制。

武吉斯人的活动及势力的发展,使荷兰人感到惊慌。武吉斯商人在廖内战舰的保护下进行的竞争,已使荷兰人为垄断马来亚锡业而做出的努力有遭到失败的危险。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终于在 1756 年爆发战争,结果武吉斯人被打败。1758 年武吉斯人与荷兰人缔结和约,确认了荷兰人的锡业垄断权。

但 1760 年,当苏莱曼去世的时候武吉斯人把他的继位人杀死,另立苏莱曼的孙子,于同年出生的婴孩为王。于是丹·柬布阁便以监护人的身份,继续充当柔佛的事实上的统治者。到武吉斯人首领罗阁·哈吉(Raja Haji)统治的 1777 年,廖内已经成为非常大的锡贸易中心,他们从马来亚的西海岸和邦加与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中国的商船进行走私贸易。这些商船在 8 月之前进入廖内,然后带着获得的大部分锡到广州。

荷兰殖民政府对武吉斯人的锡走私行为极为愤怒。1782 年战争再次爆发,直到 1786 年,荷兰人再次取得优势,强迫雪兰莪的武吉斯人苏丹伊布拉希姆(Ibrahim)签订条约,承认荷兰的宗主权,给予他们锡的垄断权,并保证驱逐雪兰莪的所有其他欧洲人^①。

1795 年,法国革命军入侵荷兰,英国人开始占领荷兰在东方的属地,赶走了廖内的荷兰驻军,使武吉斯人重新恢复了在廖内的权力。但应该说明的是,到 18 世纪末叶,武吉斯人的贸易扩张在一些大国的干涉下,受到了很多挫折^②。

(二)以三马林达为中心的对外贸易

三马林达位于婆罗洲东海岸马哈坎上,是武吉斯人聚居的大本营。望加锡陷落后,一些武吉斯人迁移到与西里伯岛相邻的婆罗洲东海岸的库泰地区,并居住和繁衍下来。

航海贸易是武吉斯人的主要谋生手段,“上至王子下至农民都从事航海贸易活动”,因而,以三马林达为中心的商业贸易很快发展起来。“所有从库泰启航的商船都停泊于此,所有这个国家的大规模贸易的办理亦于此完成,所有到达的船货会立即由武吉斯商人购买,然后用小船发往全国各地的代理商,三马林达成为所有进出口商品的大仓库。”^③

在武吉斯商人的经营下,库泰地区每年接纳和发送的各类商船数约有 705—725 艘。商船所到达的地区非常广泛,主要有:西里伯岛上所有武吉斯人的本土地方,爪哇以及其他荷兰殖民者控制地区的所有港口,马来半岛的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柔佛、彭亨,婆罗洲西海岸的坤甸、斯拉库、三发、淳泥、沙巴,以及苏禄群岛。

这些商船从库泰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燕窝、蜂蜡、琼脂、海参、玳瑁、金粉等^④。它们大多来源于与武吉斯人邻近的、处于内陆的土著民族达雅克人。达雅克人虽然不知农耕,仅靠采集和狩猎为生,但他们生活的地方盛产金、钻石、藤、树脂、樟脑、野蜂蜡、蜂蜜、野生西米、橡胶、珍贵木材、多种野果以及燕窝等^⑤。达雅克人所产正是武吉斯人贸易所需。为了控制这些产品,武吉斯人一方面通过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则通过用达雅克人日常必需或急需的消费品交换来达到目的。

① L. A. 米尔斯:《1824—1967 年的英属马来亚》,第 75 页。

②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上册,第 433 页。

③ J. H. 摩尔:《马来群岛及其毗邻国家纪闻》,第 67 页。

④ J. H. 摩尔:《马来群岛及其毗邻国家纪闻》,第 55—57 页。

⑤ G. W. 厄尔:《东方海域见闻》,第 327 页;陈鹏:《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5 页。

达雅克人由于深居内陆,食盐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武吉斯人通过限量供给的方式来操控与达雅克人的贸易。每当武吉斯人的盐船从望加锡归来,达雅克人并不能立刻交换到大量的食盐,因为武吉斯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价格标准用食盐来交换达雅克人的所有产品。在交易中,如果双方因成交价格而发生争吵,武吉斯人就会停止向达雅克人供给食盐,迫使苏丹不得不将其上述所有物的一半作为礼物送给武吉斯人,以此为条件来换取食盐的供给^①。又如登加龙(Tongaron)的酋长曾经与武吉斯人作战,但不久他即被迫乞和。原因是武吉斯人切断了内陆达雅克人的食盐供应,这些达雅克人联合起来,驱逐了这位酋长,迫使他反而寻求武吉斯人的保护^②。

武吉斯人由于在与达雅克人的食盐贸易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因此,他们从中获得的利润是惊人的。首先,食盐贸易在所交易的地区苏丹征税很少,甚至不征;其次,食盐买卖的差价很大。一般食盐在望加锡的平均价格是每Coyan^③8—10卢比(Rupees),1828年是8卢比。运到三马林达所卖的价格是50里亚尔(Reals),在登加龙,平均价格是85里亚尔。距离河越远价格越贵。在麻浦(Marow),由于距离海约有600英里,所以它名义上的价格是200—210里亚尔,而实际上交换的比率是很难计算的,双方其实是按照实物交换的方式来进行的。根据曾到过达雅克人部落进行调查的道尔顿(Dalton)所见,蜂蜡与食盐是按照重量1:1的比例进行交易,黑白燕窝也是^④。的确,武吉斯人在与达雅克人进行的这种实物交换中所获得的利润是难以置信的。

烟草是达雅克人重视的另一种商品,它大多来自爪哇的各个港口,主要是三宝垄。停止供应烟草,对达雅克人来说与停止食盐供给有着相同的效果^⑤。

(三)与新加坡的贸易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南部的出口,是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及其以东岛屿间进行贸易的天然中心,不仅便于商船停泊,而且是从欧洲、印度到远东的最短的贸易航线。因而,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和东方商人彼此交换各自产品的中心。

但这并不是吸引武吉斯人抛弃近在家门口的荷属港口而去寻求几百英里之外的新加坡进行贸易的主要原因,令武吉斯人趋之若鹜的是,到新加坡贸易没有关税,也没有烦琐的港口规则。恰如斯坦福·莱佛士所言:一个商业上不征收关税、港口规则几乎不存在的城市,将会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⑥。

受此影响,婆罗洲东海岸,即从最南端的塞拉坦角(Salatan Cape)直到苏禄群岛长达1000英里的广大范围内,其间的每一条河流上都是武吉斯人新造的贸易船只。西里伯岛西海岸以及聚居于群岛各处的武吉斯人亦作着相同的准备,他们希望参与到这既充满利润诱惑又昭示公平竞争的贸易行列中来^⑦。

武吉斯人的商船到达新加坡的时间各有不同,西里伯岛的武吉斯商人一般在9月份到达;靠近

① J. H. 摩尔:《马来群岛及其毗邻国家纪闻》,第69页。

② G. W. 厄尔:《东方海域见闻》,第330—331页。

③ Coyan或Koyan,是东南亚地区广泛使用的一种质量单位,但各地方的换算各有标准:在沙捞越1coyan=3098磅;在泰国1coyan=1200千克;在19世纪的缅甸1coyan约等于3.637立方米;在马来西亚1coyan=40piku(担),约5333.33磅。

④ J. H. 摩尔:《马来群岛及其毗邻国家纪闻》,第70页。

⑤ J. H. 摩尔:《马来群岛及其毗邻国家纪闻》,第70页。

⑥ L. A. 米尔斯:《1824—1967年的英属马来亚》,第193页。

⑦ J. H. 摩尔:《马来群岛及其毗邻国家纪闻》,第15页;黄麟根:《1819—1869年新加坡对外贸易》(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1869*),新加坡1961年版,第74页。

新加坡、来自于婆罗洲西北海岸及荷属港口,如三发、坤甸和曼帕瓦的船只到达的时间在 6 月和 9 月之间;而婆罗洲东部和东北海岸的商船到达新加坡的时间是 9 月;从巴厘岛开赴的武吉斯人商船到达新加坡则是在 10 月份。

武吉斯人与新加坡的贸易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但是通过零星的记载,我们仍能管窥它的贸易量、贸易价值和它在整个新加坡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乔治·温莎·厄尔在《东方海域见闻》一书中有记载说,在三发以东 100 英里处是一个武吉斯人的聚居地,现在成了婆罗洲南部海岸的贸易中心,每年约有 30 多只当地居民的快速帆船访问新加坡;而在南部和东部的一些非武吉斯人聚居区的岛屿上,在 1834 年即有超过 100 多只的武吉斯人快速帆船,估计带有 3000 吨的货物,到达新加坡^①。约翰·克劳福德的论述则更为全面,他说,马来群岛与新加坡贸易的最大部分是与瓦乔武吉斯人的贸易,它是西里伯岛的一个民族,他们居住在群岛的许多国家。通过他们,新加坡达成与瓦乔、曼达尔、卡莱、望加锡、帕里·帕里(Pari-pari)、波尼拉梯岛(Bonirati)、松巴哇岛、巴厘岛、龙目岛、弗洛勒斯岛、萨武岛、帝汶岛、塞兰岛、阿鲁群岛、新几内亚岛和婆罗洲东西海岸的贸易。这些不同国家的产品由武吉斯人进口到新加坡,主要有:带斑纹格子呢棉布、油、大米、苏木、玳瑁、燕窝、海参、天堂鸟和大量鹦鹉族的活鸟及异常美丽的羽毛。这些货物每年由超过 100 只的武吉斯人的快速帆船运到新加坡,每只船进口货物的价值从 1.2 万—3 万西班牙银元不等。他们带回去的货物主要有鸦片、英国和印度布、羊毛织品、火器和火药、中国的陶器以及暹罗的铁制烹调器具^②。

可见,武吉斯商人在对新加坡的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黄麟根在《1819—1869 年新加坡对外贸易》一书中的评价是:“在与新加坡贸易的马来群岛商人中,武吉斯商人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们作为群岛贸易的主要执行者已经超过了马来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将群岛东半部的产品带到西半部的港口,尤其是欧洲人控制下的港口,这些日用品销路好,并可带回交换的欧洲和印度的货物及其他产品”。这种贸易对英国人来说尤其显得意义非凡,因为英国的产品能够渗透到遥远的、欧洲商人很难到达或几乎不去的那些群岛地区。比如,帝汶岛上的居民几乎不消费英国的产品,但这种现状随着武吉斯商人与新加坡贸易的实现而发生了改变。武吉斯商人带到帝汶岛的主要商品中有大量的英国和印度的产品,如鸦片、铁盘、盐、烟草、硝石、铅、陶器、大米、紫梗(Stick-lac)、南京布、生丝、步枪、火药、金属器具和印花布等^③。

作为新的贸易中心,新加坡的对外贸易严重地冲击了荷属港口,使他们在马来群岛的贸易受到很大损失,如三发、坤甸和曼帕瓦便失去了他们对新加坡的贸易。更让荷兰人担心的是武吉斯商人从新加坡引进英国棉布会破坏他们的关税壁垒。为此,荷兰人将英国棉布的进口税提高到 35%,企图以此来阻止英国棉布的进口,但荷兰人的举措并没有见效,武吉斯商人仍然将英国棉布引进望加锡。1834 年,荷兰人将关税增加到 70%,然而高关税也没能阻止英国棉产品的流入。1835 年荷兰人不得不下令终止这些商品直接从新加坡进口,不过,来自望加锡的商船仍然继续不断地开往新加坡^④。在其他地方,如三发、坤甸和曼帕瓦,荷兰人也企图阻止马来人和武吉斯人的商船与新加坡进

① G. W. 厄尔:《东方海域见闻》,第 338—339 页。

② 约翰·克劳福德:《使暹日志》(John Crawfo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china*),伦敦 1828 年版,第 543 页。

③ 黄麟根:《1819—1869 年新加坡对外贸易》,第 74、76 页。

④ 黄麟根:《1819—1869 年新加坡对外贸易》,第 73 页。

行贸易,但也没有成功^①。

荷兰人除了采取各种手段阻止武吉斯商人与新加坡贸易外,从1831年开始还积极筹划在望加锡建立另一个与新加坡相竞争的自由贸易港口。他们认为与新加坡相比,望加锡有下列优势。第一,望加锡位于商业上有利的位置,它距离婆罗洲最近的地方约250英里,与爪哇的东北端约有500英里,处在望加锡海峡的最前端,位于往来于爪哇和马鲁古群岛及往来于欧洲、印度和中国间的直接贸易航线上。而且望加锡还位于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航线上,这个国家与中国间的轮船贸易事业正越来越多。因而,它更能吸引西里伯岛西海岸、婆罗洲东海岸及毗邻岛屿的贸易^②。第二,对武吉斯商人来说,到望加锡贸易意味着不再需要长途航行25—40天穿过海盗活跃的海域,冒险与新加坡贸易^③,也不必再考虑因为错过季风而丧失当年到新加坡贸易的机会^④。

拥有这些优势,荷兰殖民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使武吉斯商人在望加锡“能够免税卖掉他们自己的货物,并使其能够以与新加坡一样便宜的价格购买其他的商品。而且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种商品的贸易应该同样地实行免税政策”^⑤。

1847年望加锡自由贸易港的成立严重地影响了武吉斯人与新加坡的贸易,使得武吉斯人到新加坡贸易的船只数量逐渐减少。1828年,有超过100只的武吉斯人的商船与新加坡贸易,1840年则上升到200只,甚至在1845年,即望加锡成立自由贸易港两年前,仅从西里伯岛到达新加坡的武吉斯人商船就有100只。但在1848年——望加锡成立自由贸易港的第二年,武吉斯人与新加坡贸易的商船数便锐减到76只,1866年则只有31只^⑥,武吉斯人与新加坡的贸易衰退了。

到19世纪中期以后,武吉斯人的航海贸易逐渐走向衰落。关于衰落的原因,以下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望加锡自由贸易港的成立虽然使新加坡失去了来自西里伯岛的一部分武吉斯人的商船贸易,但新加坡与西里伯岛之间的航海贸易却未因此而中断。一些欧洲、中国和阿拉伯人的横帆船反而加入到新加坡与西里伯岛之间的贸易活动之中。武吉斯人以前在新加坡所进行的商品买卖现在只需在望加锡即可完成^⑦,尽管这降低了武吉斯人的航海贸易风险及成本,但武吉斯人的海运事业正逐步受到这些横帆船的冲击和影响。其二,轮船和汽船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也逐渐代替了原来往返于群岛之间的武吉斯人的船队^⑧。其三,荷兰人在贸易中不断增加限制武吉斯人航海贸易的措施,以及其在1858—1860年大规模入侵西里伯岛的波尼武吉斯人国家,这一切加速了武吉斯人航海贸易的衰落。

[本文作者冯立军,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马新民)

① G. W. 厄尔:《东方海域见闻》第248页;黄麟根:《1819—1869年新加坡对外贸易》,第73页。

② 黄麟根:《1819—1869年新加坡对外贸易》,第102—103页。

③ J. H. 摩尔:《马来群岛及其毗邻国家纪闻》,第74页。

④ 黄麟根:《1819—1869年新加坡对外贸易》,第102页。

⑤ J. H. 摩尔:《马来群岛及其毗邻国家纪闻》,第74页。

⑥ 黄麟根:《1819—1869年新加坡对外贸易》,第104页。

⑦ 黄麟根:《1819—1869年新加坡对外贸易》,第104页。

⑧ J. A. 米尔斯:《1824—1967年的英属马来亚》,第203页。